

今日評論

第一卷 第二十二期

時評

全國生產會議收穫(倍)

日圓在滬跌價(倍)

英土談判與蘇土協定(貢)

財權與政權

民治與吏治制度

論促進地方自治應自城市始

戰時西南衣料問題

被批評

冷屋隨筆之四

王毅愚

毅真

呂學海

陳建棠

希聲

錢鍾書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全國生產會議收穫

全國生產會議於五月七日在渝開會，到代表一百六十多人，提案有三百八十多件，舉行了一個星期的會議。關於這會議，報上已登載的有蔣委員長長的訓詞，孔院長的開會詞和閉會詞，及該會議的宣言書。至於會議中所通過的議案主要的有什麼，對於將來生產的政策和計劃有什麼具體的決定，我們還沒從報紙上得看到。把那訓詞和宣言書上所發表的意見總括起來觀察，有些是對於我們一向已認定的方針加以重申，如重工業及國防工業以國營為原則，輕工業以政府獎勵民業為原則，一切生產須以國防為中心，經濟行政機構需充實，農村經濟需救濟，合作運動需提倡等等。至於那可以算為從前還沒最大注意而現在因為得了經驗的教訓更感覺其重要的有下列幾項：（1）生產技術的改良，（2）技術工人的訓練，（3）運輸的發展，（4）「區域經濟計劃」的厘訂，以求各區域充分地發展其最適宜的產業。會議宣言書是一篇重要的有價值的討論中國經濟政策問題的文件，對於今後中國農林礦工發展的途徑，以及交通，貿易，勞工生產技術等問題都加有討論，並且貢獻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但是有幾點我們覺得還需要考慮或加重的。例如與築輕便鐵道以補救目前交通困難；建築長距離的輕便鐵路不是一個實際上容易實行的辦法，我們從運輸工程師所聽到的意見不最一致，有的以為建築輕便鐵路還是需要巨量的外來材料和不小的建築工程，其所需的时间金錢和勞力雖然可以較低於標準鐵路的，而其運輸能量則非比例地低於標準鐵路的運輸能量。又關於經濟開發所需要的鉅額資本如何招集，宣言書上說：「集收游資之方法，莫善於合作事業之推廣」。這句話的意思我們不大明白，我們以為合作事業是推輸資本到農村的一種機關，而不是一種主要的成積資本的機關；普通是有了資本，可以更容易地把合作事業推廣。關於外資的招引和利用，宣言書上沒有提到。我們以為這是個要緊的問題，要想迅速地大規模

地開發中國經濟，我們需要招引巨額的外資。使我們感覺失望的是宣言書上對於工業化和機器與機械動力使用的必要沒有特別加重提出，對於家庭手工業尚懷着通常的留戀和期望，對於機械生產，還在徘徊憂慮其會引起失業的影響。這宣言書的見解謹慎的成分較大，而誇大的成分較小。（信）

日圓在滬跌價

上海來訊，近日日幣在滬日趨暴落，兌換店中，日幣一元僅換法幣九角八分三厘。此事已引起日方的嚴重注意。日大藏省駐滬事務官本月廿日回國商談此後採用何種方法，以挽救此局面。日與駐滬華中聯絡部駐滬財政辦事專員與日本銀行駐滬辦事處刻正力求合作實施種種挽救辦法。

日幣在滬價值下跌已有相當長久的時期。近來的暴落不過充分暴露日幣基本日弱點，證明敵國內法定匯價不能代表日圓真正的價值。過去日圓在滬繼續下跌一個大原因就是日偽在華北的金融政策。為想排斥在華北的法幣以遂其控制金融的目的，日偽在華北成立所謂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鈔票。為包括華北經濟于日圓金融集團之內，偽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與日金構成法定聯繫——壹元聯合銀行鈔票等于日金一圓。在偽銀行新組成時，華幣尚維持其十四便士之匯價，故為方便起見，偽鈔一元亦等于一元法幣。然自中國統制外匯後，上海之華幣暗盤跌至法定匯價之下。因之當時日幣在滬與華幣的比價亦加漲——一日元約值法幣一元五六角。于是便產生投機情形。投機者可以在華北以法幣，以平價或官價，（正月以前華北法幣之官價為偽幣百分之九十）購買偽幣，以偽幣購買日幣，運日幣到上海，再予以換回法幣。如此數轉折便可獲巨利。如此日幣繼續流滬，價值因之繼續下跌。這是三四個月以前的情形。在近四個月內，華北敵人對於此種投機私運情形的監視阻止是否有十分的效驗，可惜華北來的金融情報不詳確，我們不能驟下判斷。如果這種投機的情形還是或明或暗的繼續，那麼近二月來偽幣狂跌的情形，當

然更加强投機者利益，而日幣更當奔赴上海，其在滬之價值當然更是狂跌。我們猜想這一個因素還是有攸慮的餘地。如是這個猜想尚不錯，那就算是敵人弄巧反拙，自食其報。

日幣最近在滬的暴跌還有一個可能的因素。日來日圓貶價的傳說，實屬臆土。這也許可以加強日幣在滬下跌的趨勢。不過這個理由是否有根據，要待此後事實的證明。至于滬電所傳日圓跌價係因日本國內購買外匯限制極嚴，日本商人遂紛紛來滬購買外匯，鉅額日圓流至上海所致，我們猜想實情恐怕不如是簡單。因為滬匯也是外匯。若敵人國內外匯限制甚嚴，則滬匯不能獨居例外。這個漏洞太為明顯，且亦易于阻塞，除非所謂流入上海之日圓為非法的私運，那麼又不是日匯的問題，而是日鈔的問題了。（俗）

英土談判與蘇土協定

最近歐洲形勢，以土耳其為中心，有兩項值得注目的事件：一是

仍在繼續進行的英土談判，一是據傳業已訂立的蘇土互助協定。當此英蘇二國企圖接近之際，土耳其以其地位之特殊，不失為一得力的媒介。

英土二國在地中海區域所處的地位，無時不受侵略國威脅，此時固亟須企求合作；然就巴爾幹安全而論，亦不無共同協力防禦侵略之必要。據日來消息，該二國政府意見頗趨一致，似不久將簽訂長期協定，保證彼此於必要時期之互助。歐戰結束之後，英國是土人的最大仇敵，竟當侵略國主腦有待

財權與政權

近來我們又隱約聽到一種似是而非的議論，就是以爲民治是歐西資本主義的產物，它的形成過程，便是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所以民治在中國沒有社會的背景，沒有物質的條件，再度嘗試必定再度失敗。以民治與資本主義相聯而論，證諸各國政治實況，不無相當根據。但倘以詬病資本主義之故，而主張我國放棄或避免民治，則難免因噎廢食之譏了。

。在希土戰爭中，英國操縱其間，於一般土人尤難忘懷。英土重修舊好，爲時不久；近幾年來兩國往返頗密，舊恨漸除，其友誼之加強，可於這次談判中見之。至於法土二國有否接近的可能，外間紛紛揣測，莫衷一是。如果證明有其事，則英法之間從此似可掃除屢因土國問題所招致的積怨。道未始不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新變化。

蘇土秘密訂立互助協定之說，頻傳於英蘇談判開始之後。其重大意義亦不容忽視。一九二一年，蘇聯宣言放棄對土侵略野心，是世仇轉爲新交的起點。土國在復興建設中，得蘇聯物質上及技術上之援助，不可謂不多。在蘇聯方面，欲從黑海求出口，亦非拉攏土國不爲功。一九三六年七月在蒙特洛爾所簽訂的「海峽協定」中，蘇聯爭得軍艦自由出入的權利，但在享受上亦須視蘇土二國友誼之能否持續。不過，這次二國如已訂立互助協定，則除彼此得到實惠外，還會促成近東安全的新局勢，進而阻遏德義侵略的發展。

土耳其在建國過程中，維護和平是外交精神。爲達此項目的，以往保持中立，努力建設，尙稱上策。但到了最近，世界風雲緊急，巴爾幹及地中海東部的安全，殆已發生問題，而消極的「睦鄰」政策不能繼續給予保證了。土國爲已爲人計，祇有積極贊助組織反侵略陣線，逐漸求集體安全的實現。土國跨處歐亞，將來或者由其居間聯絡，推擴反侵略陣線於亞陸，如此則世界受益更大。願土國政府其善圖之。（貢）

王贛愚

近代歐西民治開端，要算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新興工商業崛起，都市地位增高，資產階級一躍而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原來財權安定是產業發達的先決條件，爲完成這項條件起見，資產階級不得不要求政權，過問政治。在他們的心目中，政權是手段，財權是目的；政權得到之後，便能藉法律，藉政策以護持財產。雖然他們無暇兼顧政治，但事實上却不難仗着自己的財力，

使政黨，操縱議會。這是民治國家中最顯明的一種現象。

財權與政權的結緣，是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表徵。資本主義以其能左右政治，獲得貫徹其精神，發揮其作用。無論人們把資本主義看成善或惡，它顯然是建築在私有財產上面的。私有財產愈發達，社會上競爭愈尖銳，以致強者侵佔多而愈富，弱者損失鉅而日貧。在舊日身分或階級是社會上「特權」的標準，至今日財富則成了政權的階梯。有財者治人，無財者治於人，誰主誰奴幾已註定了。在財權不均的社會中，政府的一切措施總是以維護資產階級為前提；所謂法律，充實着他們的成見，表彰他們的特色。在財產關係沒有變更之前，真正民治的精神始終莫由發揚，而政府亦不能遵照國家的來行使其政權。

依共產主義者的解釋，資本主義的民治就是資產階級的獨裁；無產主義的民治是無產階級的獨裁；因前者是利於極少數人的民治，而後者是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民治。我們雖然非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亦不能否認在各政治實況之下，這種說法却含有部分的真理。須知民治是以平等自由為基礎，法律上的平等自由是不夠，還需要經濟上的平等自由。共產主義者似乎是首先覺悟促進民治，非從經濟方面着手不可。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以資借鑑。

在貧富懸隔的社會裏，侈談法律上的平等自由，結果保護富者有餘，而保護貧者則不足。近代國家認須依法保障的個人權利，首推財產權。任何人取得財產，概受法律同等保護，不因階級差別而異其施，亦不因地位尊卑而有軒輊。然我們仔細觀察，便知所謂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往往成爲民治精神的致命傷，社會擾亂的根苗。在私產制度之下，謬赤貧與巨富互相競爭，而前者沒有不受排擠而趨窮境；讓勞動羣衆與資本家締結契約，而後者又沒有不佔上風。私產之有無和多寡，足以決定一般人在經濟上的幸與不幸。財產的攘奪愈劇烈，貧富的不均愈顯明，社會中人無論爲生產，爲消費，愛何業，任何職，處處都感強凌弱之苦。

在歐西各國，我們固不否認民治是資本主義的偶然產物，但不能承認它是與資本主義絕對不分的一種政制。人們慣說十九世紀是民治的黃金時代，因爲當時就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現在是民治沒落的時代，也因爲現在就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其實，資本主義只是客觀的經濟制度，本無先天的利弊；而民治的最大障礙是財權的過分膨脹，而不是私產制度的存在。坦率地說，在當今各國社會組織之下，去根本搖動私產制度却非上策，除非有產階級自願拋棄已得權益外，終久會釀成暴力的社會革命。貧富互相軋轢，勢必兩敗俱傷，則國家不幸已極！民治須以生活安全爲前提，這種安全現行資本主義已不能繼續供給，但亦決非採用階級鬥爭所能得到的。財產是個人生活安全的條件，小之可以避免私人權勢的壓迫，大之可以鞏固社會合作的基礎。無產者往往因爲本身生活不安全，從事政治的冒險，非走極右，便走極左，對於現狀總是不滿的。蘇聯獨裁政治初起，固是以無產階級爲支柱，而意德黨治的持續，又何嘗不特賴成千累萬無產者的擁護呢？近今民治的萎靡不振，歸根要歸因於各國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多和生活不定。人無恆產，挺而走險，以謀傾覆現狀，是必然的趨向。國家與其鎮壓於後，毋甯防患於先。亞里士多德認定貧是亂源，欲求政治穩定，要以增加中產階級爲要着。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家也早就看到恆產的重要性。孟子說過：「無恆產而無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驕邪侈，無不爲已。」如荀子，管子及商鞅等主張，與孟子頗多出入，大抵都抱先富後教之說。原來私有財產是爲社會全體而設的制度，決不是爲一階級或少數人而設的制度。但許多人竟認私產制度係爲資本者而設，所以要想爲勞動階級的利益，而主張根本廢除，這是何等重大大的謬解。私產制度既是一種社會制度，它的存廢當然應視其對社會全體之效用如何而定。以往個人圖謀財富以自給，今則圖謀財富以制人；以往有財得充其經濟慾望，今則有財又可發其政治慾望；以往所謂財富類多指出自勞動所得的有形物，今日所謂財富則類多指出自資本所得的無形物；以往談財產每以其客觀性質爲標準，今則每以其對

人關係爲標準。財產形態改變了，政權公諸大眾，殊爲不可能。近代經濟學上所謂「經濟人」，政治上又所謂「政治人」，假定前者以求財富爲主要活動，後者以求政權爲主要活動。但我們仔細一想，這兩種制度是完全出於抽象，而與實際生活不相應。一國以內，財權與政權既合併爲一，其所行的政治不過民治其形式，專制其精神而已。政治平等與經濟平等，本應相輔而行，二者不容須臾分離。侈言前者，而忽略後者則距離真正民治甚遠。

我們從民元以後觀察，我國民治的不成功，其中原因甚多，時權固無限膨脹不在內，因爲我們還談不上歐西資本主義；貧富的過分不均也不在內，因爲全國以內只有大貧小貧之別。貧即亂之源，亂的結果，使民治莫由循常軌以發展。二三年來，國家既經稱共和，人民當然居於最要的地位；殊不知所謂民國主人翁者，其中十之八九都是在死亡線上顛轉，不但無知無識，甚且至於無衣無食的。自己求溫飽不可得，更說不上表示意見參與政治了。這種矛盾現象一天不消除，政治終久不會上軌道，國家的基礎也是不會穩固的。

自入民國後，政治制度未必都壞，祇欠缺運用制度的人。忽然讓這錢袋裏的羣衆起來管理國事，是難如登天的事。中國大多數人，因爲工商業不發達，出路維艱，淪爲赤貧。雖然其餘少數人生活比較優裕，但亦是非常不安穩的。這少數人不是工商界鉅子，而是軍閥，政客，官僚，官辦之流。他們幾乎與生產事業隔離，根本不配不上做資產階級。在歐西各國，資產階級爲保持其財產，必須爭求政權；爲發展繁榮起見，又不得不過問國事。其目的私中有公，其手段力求公開，其結果亦無礙大局。反過來看，中國的極少數有產者，在政界上祇要據奪政權直接以發財，「國家利益」或「社會幸福」的觀念，始終不在思慮之列。他們幾乎個個是「財奴」而不是「財主」，「爲己」而不是爲「爲公」。所謂「資產階級」的勢力惡化了，民治便失掉了一個推動力。此外還有極少數的知識階級，因爲長於咬文嚼字，在政治上也成了主要活動份子。他們自來也是往往勾結軍閥，依附外敵，站在政治常軌以

外，演出爭權奪利的把戲。

一國智識階級，其言論舉止本有左右社會的趨向；在促進民治的時候，尤應負起領導民衆的偉大使命。民國國內政黨大半是智識階級的大本營，他們背後並無工商業主做後盾，鉅大黨費全無着落，甚至自身生活亦毫無保障，完全不似歐西黨員職員有資本家爲台柱，使其財力作政治的活動。智識階級在經濟上既走弱者，而在政治上當然沒有獨立地位和自由。證諸事實，他們祇有追逐軍閥，官僚，外人之後，撈奪政權以謀生，縱橫捭闔，此迎彼拒，卒令芸芸衆生莫知所從。

我國社會向來沒有資產階級爲重心，政治所以無法從早上軌道，這或者是事實。但我們今後圖謀民治實現，却未必要走上歐西各國資本主義的舊路，而促成財權與政權迭互爲緣的局勢。中國的大病是普遍的貧窮，而普遍的貧窮顯然是由工商業落後所致。發展工商業，不問採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方式，其功效不外是增進一般人的富力，使生活比較安全，而有餘力完成其獨立公民的義務。實行民治者首要人民有政治能力和興趣。要培養政治能力和興趣，爲政者又不得不轉移目光到大衆生活上去。人民有養，然後有教，兩者俱備，自然能辨別是非，能熱心公益，沒有不樂於過問政治的。財權普遍化的社會，是最健全的社會。政權的更替不至爲少數有產者操縱，以行寡頭政治之實。

向民治大路上去，我們在經濟建設過程中，不論採用何種生產方式，對於財產的傳統觀念，應該根本加以變更；對於財權分配問題，又當逐漸求一適當解決。

現代一般國家，雖處處干涉財權，然莫不以此爲例外。財權的傳統觀念，所以亙久未變，並非無因。扼要的說，各國政府自來就是資產階級的堡壘，財權的運用都是受法律的威力所保護，若社會上貧富輒轉而生暴力衝突，則政府祇有假維持社會秩序的美名，甘心爲富者所奴使，抱着厚此薄彼的態度，絕不肯保持其應有的中立地位。大衆生活日趨窮蹙，對政府懷怨加深，

不平則鳴，挺而走險，終必釀流血革命。在這種情勢之下，任何政府，倘徒用淫威來懾服大家，而不從速圖謀生存欲望的普遍滿足，其精神，其施政都是與國家目的背道而馳。

依我所見，國家調節財權，不應以絕對平等為標準的，却應以社會正義價值。財權的絕對平等，是共產主義者的呼籲，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經濟生活的最高原則。這種主張，立論似乎過於簡單，且與事實不相應。在現今世界上，人類慾望無窮，貨物數量有限。硬要「各盡其能」，則其所盡者未必是充分之能；硬要「各取所需」，則其取者恐又是過量之需。由是爭奪的現象又將發生了。人有動情智愚之別，而生財富的不均，若非太甚，倒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須知財產半為個人努力的效果，半為社會造成的權利，因此所有者在行使上不能漫無限制。以自己努力得來的財產，徒供自己的享用，於情於理，均屬正當。反之，以遠超需要限度以上的財產，為壟斷政權的手段，便成民治難行的癥結。財產的分配，不宜強求絕對平等。國家對個人盡職所得和生存所需的適度財產，應加特別保障，老實說來，財產離開倫理的基礎，便要失掉存在的根據了。

民治與吏治制度

想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在政治方面的要素是不少，而其中至少要建設起兩種健全的制度：一種是要能隨時表示全國人民一致的團體意志；一種是要能忠實負責地來執行這團體意志。前者可說是民治；而後者可說是吏制。這兩種制度，有時雖是單獨存在，然而却要牠們能夠密切聯繫，相互扶助；若是缺少了一種，就很難成爲一個現代國家的。

在我們中國，提倡民治已經有四五十年的歷史了，不過却還沒有樹立起制度來。至於講究吏治，說來可算是我們的國故了；可是不幸得很，吏治情形還是紊亂非常，漫無定制。固然我們知道，一種制度的確立是要經過不斷的努力奮鬥，要經過相當時期的累積作用。我們看一看歐美民主制度的穩流

在推行民治的過程中，我們不宜偏重政治自由，而忽略了經濟平等。這裏所謂經濟平等，係指相對的平等，而不指絕對的平等而言。適當限度的財產，是個人合理要求。滿足了這個要求，而後在社會上纔能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巨富因恃財多而專橫，赤貧因無所依而浮蕩，二者短見狹量，直如五十步與百步之比。所以我以爲真正民治應該是以「中產階級」為骨幹的政治。一國以內「中產階級」的份子增加了，無形中便增加了社會安全的因素。要這樣做去，未必須廢止現行私產制度，致引起無謂糾紛。據我們看來，最穩當的途徑莫如讓政府運用調節財產的權力，以消弭富貧過分不均的危險。在所有權與正當使用分離的時候，國家干涉更不容絲毫放鬆的。誠然，我國現在無謂貧富的不均，祇是在普遍貧窮之中，強為大貧與小貧之別。表面上似乎問題癥結在生產，而不在分配。然生產與分配，似可分而實不可分；不若重分配的生產，終久會生乖離不平之勢。財權分配轉向均衡，社會生活便趨於安定；只有社會生活趨於安定，民治賴以發達。這並非迂闊之談，而是不可顛撲的道理。

毅真

是經過那麼長期的奮鬥，而吏治制度的確立也是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我們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也決不能存一蹴而成的奢望。近來國內人士要求「政治制度化」的呼籲和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中確立民主法治制度的提案，正可以表示出社會上對於建設現代國家的努力。

可是我們却也不能漠視近來政府對於這方面的注意。在國民黨的黨義和黨綱裏都充分地表示著民主制度是建國的標的，並且很慎重地規定著實施憲政的步驟和方法。鑒於辛亥革命後立即實施民主制度的失敗，因此堅決地主張要經過相當時期的訓政工作，來訓練全國人民有運用民主制度的能力。鑒於建國的基礎要鞏固，因此嚴格地規定著實施憲政要從地方自治——縣自治

做起。現在訓政工作已經有了近十年的歷史，在各方面却也有不少進步，不過對於民主制度的樹立，看來尚似渺不可期。因此更引起一般人士的熱烈討論和貢獻不少有價值的建議。

有人主張地方自治應當從城市開始推行，等到城市方面已辦有相當成效後，再向外推廣。這個建議却很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本來培植一種新制度，總要選擇一個相當有利的環境，才比較容易發榮滋長。城市的人口繁稠，社會生活的密切，文化水準也較高，可辦的地方自治事務也較多，並且經費來源也較富，技術人才也易求——這種種大體可以說是推行地方自治的有利條件。不過要想從城市自治所得的經驗而推廣到鄉村去，却又不能忽視鄉村方面的環境了；否則為格為積，是很可考慮的。因此有人主張在市區內應當包括些鄉村區域，一方面做推行鄉村自治的實驗，他方面還可做將來城市繁榮起來擴張區域的餘地。這個修正當然比較原議完善得多。在這實驗鄉區裏，能够得到市區的協助和指導，當然進行要容易些；而將來推廣到其他鄉村去的時候，也不致對於鄉村問題太隔膜。

然而有人以為過去曾有許多實驗縣和村自治的嘗試，結果都證明失敗；因此對於由地方自治開始憲政的步驟和方法也以為是錯誤的。固然我們知道，歷史上實現憲政的方式却不少，而地方自治和憲政並不都有密切的先後因果關係。可是過去實驗縣等的失敗，却不是推行民治的失敗，而是推行新政的失敗。這個失敗所昭示給我們的經驗，歸根結底還是民治和吏制的兩個缺憾。

我們大家都承認，民主制度的確立，是需要社會的力量來推動，來制裁。我們也都知道，政治的力量却是社會力量中最有組織最有強制力的一種。用政治力量來建設起一種新制度，比其他社會力量有效得多。訓政時期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培養民主力量，由這民主力量來改造我國生產文化落後的經濟社會環境，來奠定現代國家的基礎。不幸過去這幾年却漠視了這工作，大部份國民的政治認識還依舊很模糊；對於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任務，大都沒有感到興趣，依舊抱着「莫談國事」的態度。在民主國家裏，社會力量比較

容易組成政治力量，比較容易表示全國人民的意志；而法律的制裁，得到社會力量做後盾，也比較容易執行。抗戰以來，政治方面似乎有了新的轉變，如國民參政會和各地地方民意機關的設立，都表示出政府和社會上對於推行民治的努力。固然從他們的組織或職權上來衡量，距離民主制度還很遙遠。不過在現環境中能够正當地行使起來，不但可以溝通人民與政府間的意志，也能訓練人民初步運用民主制度的能力，增加國民的政治認識。只要我們有走向民治大道的決心，改善加強這種民意機關確是我們應當繼續努力的。

關於吏治制度的建立，也早已引起國人的注意和努力了。只要稍微留心實際政治的人或有些政治經驗的人，也都認識官吏在政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本來「為政在得人」，和「人盡其才」，是我國歷史上用人行政的原則。一個有野心的君相或是開明的帝王，也都「求賢若渴」，或是「千金市駿骨」的。不過我國歷來講究吏治的基本精神，說得好些是「與我共治天下」；若是說得露骨些，就是「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可是歷來講究吏治，雖然有時具些考選，銓敘，監察等規模，却沒有樹立起完善的制度來。

近來有人見到歐美方面已經建設起較完善的吏治制度，也曾介紹到我國，正努力地提倡着。又由於客卿所主持的郵政，海關等有了比較穩定的吏治制度，得到一般人的信仰，想努力地建設起同樣完善的吏治制度，不過所介紹的似乎還偏於技術原則方面，而國內人士也大都認為這不過是行政技術問題，而似乎忽略了歐美民主國家吏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我們固然承認一個完善的吏治制度是有牠的原則，如才能稱職，無弊久任，薪賦公平，獎懲嚴明，昇黜有序等等；再由這種原則生出關於職位薪俸考銓任用，考績獎懲，遷調昇黜，訓練進修，退休養金等科舉化的技術問題。可是我們知道任何制度都有其技術問題，而重要的還在乎制度的基本精神。一個健全的吏治制度，其基本精神却是官吏是對國民負責的，由這責任心而生出對公共事務的服務精神。

在民主制度的國家裏，吏治制度中的事務官對於政務的執行，都是直接

間接向人民或民意機關選出的政務官負責的。當官吏執行政務的時候，尤其是和人民發生直接關係的官吏，都是抱着對公共事務服務的態度。凡能便利於人民的地方，總設法予以利便，却不因任期的穩定，報酬的多分而喪失了責任心和服務精神。由於這種責任心和服務精神，每個官吏總能發揮其智力，運用其職權以求有益於社會，纔不致於彼此推諉或漠視人民的便利。

從前中山先生訓練革命軍人和黨員的時候，曾經屢次講過「不要想做官發財而要立志做大事」的話。這是針對着舊社會中官吏的不負責任和漠視民瘼的惡習慣而發的，却不是說做了官吏後就不能做事的意思。我們看到他特

論促進地方自治應自城市始

最近張佛泉先生提出促進地方自治應自城市始的主張，他說：

我以為促進自治，大體說來，應該自城市始，雖然我也承認有些例外。這話說來很長，不過「剪斷襍說」，可以這樣講：自治在中國是個新東西，而幾乎所有的新東西都是始自城市行的，而自治這樣繁複的新生活自然也沒有理由希望從鄉下人開其端倪。由新市民漸漸求出自治的方法來，作出好成績來，然後可以希望向外推廣。這個推廣的順序不見得一定遲緩，祇要上了一定軌道，便可以與時日的增長一直推廣下去。（「論政治之制度化」今日評論一卷十九期）

張先生這個主張是我們贊成的。近代的地方自治在西洋實施則有所成功，而在中國辦理却不免失敗，這問題的癥結顯然不在制度的本身，而在促進的途徑。三十年來乃至近幾年來我們所頒佈的地方自治法規，所推行的地方自治活動，和所實驗的所謂縣自治，都是偏重於鄉村地方自治的，都是注重從鄉村地方做起的，結果都證明失敗。這亦即是證明促進自治自鄉村始之非計。一切政治文化，都是適應時代環境的要求的產物或創造品。我們以往促進地方自治的途徑既是不適時境，強行自然沒有好結果，所以今後自治的出路，有賴於另尋途徑另找辦法了。張先生的主張，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新途徑

別注重官吏的才能，和將考試列為政府治權之一，考試院為選拔人才的總機關，就可以知道是怎樣地重視吏治制度了。很不幸的，現在我國吏治制度還未曾建立起。固然現在政府重視人才已經逐漸普遍，不過考試權却反而沒有行使，現在還有許多舊社會的惡習慣在作祟，在阻礙着完善的吏治制度的樹立，影響着一切行政的實施，對於目前抗戰更是莫大的惡魔。

我們現在不僅是要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不僅是要獲得民族的自由和獨立。我們同時要努力建設起民主制度和吏治制度來，奠定建國的政治基礎，走向現代國家的大路上去。

呂學海

，新辦法，和新方向，那是很值得我們考慮的。于此，我們願提出關於贊成這個主張——促進地方自治應自城市始——的幾點理由。

第一，從地方自治的性質來看，近代的地方自治，其應有的涵義，是地方人民在追求公善的目的之下，共同努力，運用民權的方法，來合理地效率地管理地方事情的意思。所以地方自治是一種很進步的新生活，很理想的政治活動。有些人以為地方自治的完成，是實施憲政的起點，是民主政治的基礎，這是把事情顛倒看錯了。其實強健的地方自治，是憲政所要達到的一個最高階段，是民主政治所要發展到的一個目的。所以地方自治只能在文化較高的地方開始實行，因為文化較高的地方便是實施憲政施行民主政治較有基礎較有準備的地方。無論何國其國內文化水準較高的地方都是在城市，而非在鄉村，中國的情形也不能例外。且看，我們的城市且稱做「國」，我們的鄉村却叫做「鄙」，我們的鄉下人會屢嘆着「不到京城終賤骨」的句子，我們的城市人却從沒有發出「不到鄉村終賤骨」的感想；這即表明城鄉二者文化高低之不同。我們以往促進的地方自治失敗的主因，就是拿沒有實行自治的文化基礎的地方自治的——鄉村——來實行自治，亦就是叫沒有實行自治的準備的人——鄉下人——來實行自治。這個失敗是意料中的事。反之

，城市是文化水準較高的地方，城市人是智識水準較高的人，對於實行自治是較有基礎較有準備的。這就是促進自治應自城市始的一個理由。

第二，從文化的發展上看，近代文化的創造和發展，她的本家和重心，幾乎沒有離開過城市的。例如民主政治，工業文明，和科學等，這都是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徵，有那一樣不是城市的產物呢？法國所有的革命，都是起自城市，而特別是法國最大的城市——巴黎。法國的革命是這樣，別家的革命也是這樣。英、瑞、諸國，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典型國家，其民治的發展也何嘗不是城市相依為命呢？因為這近代的民主政治，乃工業革命後的產物，而工業革命的策源地又是城市。而且工業革命的發生，是由于機械的發明；機器的發明，又不外是科學發達的表徵；科學的發達又是依賴于城市，而非依賴鄉村。在中國的情形亦沒有兩樣，我們的民族革命，我們的新文化運動，都是起自城市的，特別是我們最大的城市如廣州，如北平等，而絕不會起自我們的定縣，鄒平的。這是有她的客觀的條件存在的。近代文化既是城市的產物，而地方自治又是近代文化的一環，所以她只能在城市開其端倪，亦只有城市是最宜于首創自治風氣。這又是促進自治應自城市始的一個理由。

第三，從城市的地位來看，近代的城市，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工業革命的結果，使農業靠工業，鄉村靠城市，鄉下人靠城裏人。故城市在一國中的地位，城市和鄉村的關係，城市總佔優勢，總佔着主動的地位。反之，鄉村總佔劣勢，總佔着被動的地位。這不但在經濟方面是這樣，在政治文化各方面也是這樣。有些人說，鄉村是城市的基础，鄉村的問題不解決，則城市建設便無從着手。這又是把事情看錯了。事實上，近代的城市是鄉村的重心或心臟，只要城市有辦法，有生命，有前途，則鄉村的建設和繁榮，的基础

均建築在她的城市上頭。這種情形在西洋的國家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祇因我們工業化的程度還是淺薄的，以致這種情形的表現，沒有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裏那樣顯明。城市的地位就是可以影響到全國鄉村的制度文物，我們要想到地迅速地促進自治，自然要先從城市做起，先樹風氣，以資示範，而便于向外推廣了。這又是促進自治應自城市始的一個理由。

此外，城市以地勢的優越，人口的集中，工商業和教育事業各方面的發達，和整個文化水準之較高和文化內容之較複雜，人力財力自較充分，市民的團體觀念和機動性亦較強，對於新事物的接納亦較容易。這些條件，對於施行自治都是有利的。反之，我們以往辦理自治的毫無成績，論者常常歸于鄉村人力財力的缺乏，鄉民對於團體觀念的薄弱，惰性和保守性的太大。以致自治的進行，反要靠城市方面的各種協助。實際的情形既是這樣，那末，我們促進自治為什麼不自城市始呢？同時，從另一方面看去，城市既是這樣的「得天獨厚」而城市人提倡自治又是那麼熱烈，他們亦理應把自治的方案先在市區實驗成功，然後好向鄉區推廣了。已立然後可以立人，已達然後可以達人。假如我們自己還沒有資格自治，而却希望鄉下人先來自治，那豈不是自欺欺人嗎？我們聰明的城市人，有時提出的主張太不負責了，有時說話得太多而做事太少了。我們的智識階級，整天嚷着什麼「組織民衆」什麼「動員鄉村」，但是試問我們自己已經組織起來沒有呢？我們的城市已經動員起來沒有呢？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實事求是」的政治，已不是瞎吹的浮面的政治了。我們贊成促進地方自治這種新政，應該自城市開始，除上述各項理由外，這也可說是一個理由。

戰時西南衣料問題

陳建棠

「足衣足食，方能抗戰決勝」，已為公認的鐵律。西南（川、黔、滇、康）現為抗戰之最後根據地，面積一百三四十萬方公里，人口原有七千九百

餘萬，現時戰區遷來者，據外人觀察，約有三千萬，是以在現下至少有一萬萬，食方面，米糧有豐富之出產，鴉片禁絕以後，雜糧又亟亟增加，大致

無差問題。衣的方面則大大不然，試以一人一年衣被所需，最少二斤計，一萬萬人口，即需二萬萬斤，而四省之出產如何呢？第一棉花皆知爲唯一之衣服原料，四省之中，四川出產三千餘萬斤，雲南出產七百萬斤，貴州出產六百萬斤，西康向不出產，合計至多五千萬斤，第二絲、麻、皮、毛、亦爲極好之衣料，四省出產，以絲言，四川居首，年產約三百萬斤，雲南約一百四十萬斤，貴州約一百六十萬斤，西康亦不出產，合共六百萬斤，以麻言，亦以四川爲首，年產九百餘萬斤，多至一千萬斤，雲南二百二十萬斤，多至三百萬斤，貴州六百萬斤，多至七百萬斤，三省共產一千七百萬斤，多至二千萬斤，以皮毛言，川產牛皮五百萬斤，羊皮二百萬斤，雲南出產牛皮一百二十萬斤，羊皮九十萬斤，貴州羊皮八十萬斤，西康出產羊毛三百萬斤，四省合計一千二百九十萬斤，簡單說一千三百萬斤，合棉絲麻毛皮總計約八千五百至八千八百萬斤，與估計之需要量比較，差一半以上，况一人之所需，猶不止二斤，倘有非衣料之所需，如戰時亟重要之藥紗布一項，已爲數甚鉅，若將土服裝行軍囊袋，更難數計，則其缺乏之程度，可以概見。原料既如此缺乏，製造則更是可憐，以紗廠言，只有雲南一廠，錠子五千二百枚，每日夜紡紗七千五百斤計，全年不過出紗二百餘萬斤，戰後雖有溫漢之紗廠遷入川境，但建築籌備，出貨尙需有待，織布廠算在四川最多，合重慶、成都、合川、遂寧等地，共有織木機九百台，雲南只昆明約有二百台，貴州只貴陽約二十台，合計一千一百餘台，每台平均日夜出布二十斤，全年出布六七百萬斤，舊式木機，若四川之重慶、成都、璧山、嘉定、宜賓、綦江、貴州之遵義、定番、盤縣、雲南之昆明、玉溪、水昌等地，合共至多一萬架，日夜不息，出布五斤，全年只能出一千六百萬斤。而此種布機，實際上，只於日間工作，一年之中，又只於農隙時工作，其產量只能有此三分之一，即五六百萬斤，兩種合計約一千二百萬斤。絲線織與麻之織機，亦以四川最多，約有絲繭六千架，織機二千餘架，出綢年約六七百萬斤，繅麻之人工三萬名，織機三千九百架，年產麻布八十萬斤，兩共不過一百四五十萬斤，滇黔

兩省計，兩共最多五十萬斤，由是絲麻兩項合計，年產約二百萬斤。皮毛之製造更少，四川出產牛皮七百萬斤，每年出口在五百萬斤以上，雲南產牛皮二百十萬斤，出口一百七八十萬斤，貴州出產牛皮八十萬斤，出口在五十萬斤以上，西康出產羊毛三百萬斤，出口在二百萬斤以上，四省之皮毛出產，留在本地者，約只三百萬斤，而有二百萬斤，因內地交通不便，不能運出而糟塌廢棄，能利用作衣料者，祇一百萬斤。由是合棉、絲、麻、毛之產數年不過出產一千五六百萬斤，與需要量比較，相差更鉅。此種大量之缺乏，在平時抵補，只靠輸入，四省每年進口之紗布疋頭，四川值六千萬元，雲南值三千萬元，貴州值一千萬元，西康值一百五十萬元，共計一萬零一百五十萬元，戰後因運輸來源的困難，市價飛漲，若重慶二十支紗，每件售至九百八十元，普通藍布，四五角一尺，棉花八九角一斤，昆明，貴陽近北海海防、交通便利，價稍低廉，但二十支棉紗，一件亦售至七百六十元，藍布三四角一尺，棉花至一元一斤，無不增高一倍以上，由是每年之輸入值至少在二萬萬元以上，此不僅在戰時經濟上一極大之損失，而敵人又時時謀截短我交通綫，一旦無路運輸時，將有斷絕之虞，即欲忍痛漏卮而亦不可得，實予我民生抗戰以極大之威脅。

補救之道，必需自絕。自絕方法，又不外積極的增加生產，與消極的節約消費，所謂開源節流是也。顧生產，非短期內之事，現時各方面已注意提倡，如棉田之增植，蠶桑畜牧之改進等，然其收效，乃非短期內之事，故現時急策，尤以節約爲首，蓋節約一分，即等於生產一分也。考現時談節約者，咸以粗布短衣爲已盡能事，此未免過狹，蓋我人日常生活中需用衣料之地方太多，穿衣固用衣料，若吃飯用之檯毯，住房用之門帘、窗帘、地毯、椅墊、沙發椅，辦公室裏的桌布，行路時所乘汽車、輪船、火車、人力車、帆船輪馬等所用之篷布、帆布、墊布衣鞍，及運輸時所用之皮包、繩索，以及電影劇場之幕布，街頭市面之市招，何一處不見其蹤跡，亦何一處不見其浪費？因此欲談節約，決不是粗布短衣一面的問題，應從生活的各方面着手。

茲先就穿衣言，只講本地土產，不講絲毛棉麻，皆需儘量採用，有錢的人穿絲貨、皮貨、毛貨、無錢的人，穿棉貨麻貨，這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方面，并無妨害，有人主張盡穿粗布，又未免太狹，因人人粗布，則粗布實在不够分配的。故只講舶來品加以限制，取其堅實耐用，價格低廉以減少厄漏足矣，不必一定需人人粗布，此其一。縫製式樣，以微體禦寒為標準，在夏季不妨提倡短衣，冬季不妨穿袍，每置一件，必須穿至破爛，不能再穿時為止，若婦女之好時髦，日日更換，月月添新，應由社會部勸導或禁止之。此其二。穿下之成人舊衣，宜利用以改製童衣，切勿拋棄，此其三。西南之風俗，漢時不分四季，皆戴瓜皮帽，四川之老百姓，與苗人，終年以白布纏頭，一根頭巾長至數丈，盤繞於頭上，既浪費，又難看，應禁止廢除之，此其四。鞋子在鄉村中都穿草鞋，邊民苗胞婦女亦都如此，如將此種草鞋加以改良，添上鞋旁，則在都市上亦可倡用，警以敵人，禁止普通人民，穿川皮鞋，而倡穿木屐，則草鞋輕便，不難實行，此其五。襪子之穿著，在溫暖之時，無足重輕，還可廢除，或倡用短絨襪，如此直接間接，得減少棉紗之消費，與進口之漏卮，處西南之織襪業，雖未臻發達，而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等地機機亦在千架以上，每年織機開紗，不下五千件也。此其六。次就吃飯方面言，只需有一桌一椅已足，考究些加上點油漆亦已足夠，椅筵即可絕對廢除，再就住的方面言，被衾為必需品，不可廢除，但墊褥用之棉絮，則可用代替物，如平民已有用性質柔軟之草類作替代，我以為東川長江沿岸，盛出蔴

被批評

「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阻。」那是至人。常人之情，總不免為批評所動。不但為批評所動，且從批評之中，認識他自己；又從批評之後，勉勵他自己。

嬰兒學步，蹣跚蕩蕩的喊「媽媽！看！」媽媽若不看，便撲在地上，放聲大哭。自此以後，他便入了批評的羈絆，受着批評的鞭撻了。而又偏偏不

革，每至秋冬，蘭花蔴開，過去均任其膨脹，或燒火，這未免可惜，如能將其搜集起來，不能織布，作為被墊，則和暖舒適，必不下於棉絮，若江蘇之江北一帶，貧民收集之，先絞成細繩，再編為鞋子，用以冬季禦寒，較之駝絨鞋，猶過之無不及，這是我曾經親自經驗過的，所以能將其搜集利用，則一定可以省下大批棉花，至若室內之窗簾，地毯之類，本非必需品，根本可以廢除，如有特種作用，則窗簾可以紙張替代，毛織地毯，可以草席替代，既經濟亦無傷大雅，四行款的方面言，可以節省之處更多，如輪船汽車用之兜篷，可以木料代替，如為笨重，汽油費大，不妨將板片儘量鋸薄，輪馬之衣鞍，人力車之蓬布可以麻布替代。又運輸包裝在西南用之麻布者極為普遍，如能改用木箱竹篾，可以節省麻布甚多，再以此種麻布代替棉布之用途，如帆篷衣鞍之類是。五就日用上之節約言，如學校機關內應用之樓毯，也是浪費，根本可以廢除，電影劇場之幕布，街頭之廣告市招，宣傳用之標語，圖畫，可以木牌來替代，麻繩，紗繩可以棕絲棉皮替代，若雲南以牛皮切條，以代繩索尤為可惜，應設法糾正之，現在敵人禁用手套，限制毛巾縮小一寸，亦值得參考。此外更有一種浪費之事，則社會向狃於厚葬之惡習，一人死後，必穿衣數件，富者幸七八件，十餘件，此在平時猶不合理，現時更屬不當，如能倡導減低，則死一人，節衣一件，其量已屬可觀矣，凡此種種，行之並不為難，唯任由民衆自動履行，則恐難實現，故又需一方以宣傳方法，作為指導，一方組織執行機關，如衣料管理委員會之類，以為督促，方克有效，倘能急起圖之，則於抗戰之獲益，定無限量。

希聲

必其為繼與輿策。他說話要聽旁人的反響，他作事要看旁人的反應。他從旁人的話中認識自己的話，從旁人的行為中認識自己的行為；又從自己的話與行為的總和找到了他自己。換言之，他所以能找到他自己，是以旁人為鏡子。不過他自少至老，並不只用一面或一種鏡子：幼時在家庭父母是他的鏡子，少時入學校，先生是他的鏡子；長時入社會，朋友又是他的鏡子。他

的鏡子，可以放大到一鄉一國，到世界，到往古，到今。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是。他的鏡子隨着他的性格放大而放大，可以到「至大無外」，然而，他總是有「一面鏡子」。「藤之名山，傳之其人」，也還有其理想中之其人是他的鏡子。

他既是需要這面鏡子，但他又偏不要這面鏡子太清澈。合乎他心眼兒的鏡子最好是模糊點，不，最妙是一面阿諛的鏡子，照出影子來比自己好看十倍。這種鏡子是有的，但塗了青蠅之糞，後來用作毛廁的腳石了。子是虛榮心更大的人，還在四處找批評。作一件事，說一句話，滿腹盛情的希望人家批評他！其實他希望的是稱讚。無奈其話之與其希望又恰相反，于是乎而碰壁。碰壁不止一次，事一接事，痛頭而傷面，這疼這把心，一橫就變成一種虛矯的自封。凡事怕人家批評了。一遇批評，便面紅耳赤的辯護；辯護不勝，又從而躲避；躲避不了，再把心一橫，就變成一種自暴自棄的自是心。他明知他未必是，偏要自己說走……人家並未批評他，他先就自己辯護。這種偏是批評害了他也。

所以，假使批評人需要一種態度，被批評更需要一種風度。所謂風度，不只是雅量，能容納不同的意見是雅量；能使人盡言的是風度。有風度才能

冷屋隨筆之四

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實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幽默當然用笑來發洩，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劉繼莊廣陽雜記云：「驢鳴似哭，馬嘶如笑」；而馬並不以幽默名家，大約因為臉太長的緣故。老實說，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於馬鳴驢嘶，充不得什麼幽默。

把幽默來分別人談，好像拉白萊（Rabelais）是第一個。他在巨人世家（Gargantua et Pantagruel）裏，開卷就說：「笑是人類特有的本領（*opre*）」。近代奇人白倫脫（W. S. Blunt）有十四行詩一首，詠「笑與死」（*Laughter and Death*），略謂自然界如飛禽走獸之類，喜怒哀懼，

超脫，能超脫才真能接受批評。固執自己的意見是不超脫，拘泥于旁人的批評也是不超脫。把自己的事一定看作不是旁人的事是不超脫；把旁人的話一定看作不是自己的話也是不超脫。就事論事，總有合不合，不恰是自己的或是旁人的！就話論話，也總有對不對，不恰是旁人的或是自己的。事有以不合為合，合為不合；話有以不對為對，對為不對者，並非事與話容易混淆，使之混淆的還是感情。感情起于愛護自己。愛護自己的話，便不能靜氣聽旁人的話；愛護自己的事，便不能平心論旁人的事。我愛護我的話與事，旁人也愛護他的事與話。于是感情相激，分量加重，只有感情的比武，並無批評可言了。這全由于不超脫。

本來事多為人，為人則人應該有個願意不願意；話說給人聽，人也應該有個愛聽不愛聽。若拿自己看旁人之事聽旁人之話的態度來看自己之事聽自己之話，必可原諒旁人看自己之事聽自己的態度了。若拿自己看自己之事聽自己之話的態度看旁人之事聽旁人之話，也必可原諒旁人之事與旁人的話了。自己的話與事，過後想起來，不免好笑者正有，是今天的自己可以非笑昨天的自己；明天的自己又可以非今天的自己。這全在其間的一點距離。倘使我們能把自己的事已自，的話，與自己中間隔上一點距離，這便是超脫，這便是接受批評的態度。

錢鍾書

無不發為適當的聲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聲。不過，笑若為表現幽默而設，笑只能算是廢物或者奢侈品，因為人類並不都需要笑。禽獸的鳴叫，能够來表達一般的情感，怒則嘶吼，悲則嗚啼，爭則哇哇，遇冤家則如犬之吠，見愛人則如鳩之呼婦（*Cooin*）。請問世界上有幾個人真具有幽默，要用笑來表現呢？然而造物者已經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給了整個人類，面上的肌肉能做出笑容，喉間的肌肉能發出笑聲；有了這種本領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並非因有幽默而笑，是會笑而借笑來掩飾他們的沒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漸喪失；本來是幽默富有的流露，慢慢地變成了幽默貧乏的

趨蓋。於是你看見傻子的默笑，瞎子的趁淘笑——還有風行一時的幽默文學。

笑是最流動，最迅速的表情，從眼睛裏泛到口角邊。東方朔神異經東荒經，靜東王公投壺不中，天爲之笑，張華詩謂天笑即是閃電，真是絕頂聰明的想像。據荷蘭夫人的追憶錄（Lady Holland's Memoirs），薛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也會說：「電光是天的詼諧（Wit）。」笑可以說是人面上的電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間閃爍着牙齒的光芒。我們不能扣留住閃電來代替太陽和月亮，所以我們也不能把笑變爲一種固定的集團的表情。經提倡而產生的幽默，一定是矯揉造作的幽默。此類機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髏的露齒，算不得活人靈動的姿態。柏格森笑論（Le Rire）說，一切可笑都起於靈活的事物變成呆板，生動的舉止化作機械式（Le mécanique plaqué sur le vivant）。所以，復出單調的言動，無不惹笑，像口吃，像口頭習慣語，像小孩子的有意模倣大人。老頭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為老頭子不如少年人靈變活動，只是一串僵化的習慣。幽默不能提倡，也是爲此。一經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倣的，變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這種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資料，這種笑本身就可笑。一個真在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也許要在幾百年以後，幾萬里以外，纔有另一個人與此人隔着幾十間空間的河岸，莫逆於心，相視而笑。假使一大批人，喧開了嘴，放寬了嗓子，成羣結黨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藝場裏的滑稽大會串。國貨提倡，尙且增添了冒牌，何況幽默是不能大批出產的東西。所以，幽默提倡之後，並不產笑家，只添了無數弄筆墨的小花臉。冒了笑談的招牌，小花臉當然身價大增，脫離戲場而混進文化場；反過來說，爲小花臉冒牌以後，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藝只能算是「游藝」。小花臉也使我们笑，不錯！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絕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們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臉可笑，我們對着他笑。小花臉使我们笑，並非因爲他有幽默，正因爲我們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種脾氣，決不能標作主張，更不能當作職業。我們

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體；換句話說，好像女人，幽

默是水性。把幽默當爲一貫的主義或一生的衣飲飯碗，那便是液體凝成固體，生物製成標本，情人娶作主婦。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買幽爲生，作品不甚看得，例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德國人好講幽默，然而愈講愈不相干，就因爲德國人是做香腸的民族，錯認幽默也像肉丁似的，可以包紮得停停當當，作爲現成的精神食料。像李希德（Jean Paul Richter）小說笑史（Quintus Fixlein）序文中所講的幽默，竟是整齊劃一的宇宙觀。德國人自己也覺得這種看法必至毀滅幽默，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三日文藝談座（Blä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有論德國幽默一文，早就批評李希德違反常識。幽默減少人生的嚴重性，決不把自己看得嚴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對於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對於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爲一個口號，一種標準，正是缺乏幽默的舉動；這不是幽默，這是一本正經的宣傳幽默，板了面孔的勸笑。我們又聯想到馬鳴蕭蕭了！聽來聲音倒是笑，祇是馬臉全無笑容，還是拉攏長長的像追悼會上後死的朋友，又像領導青年的先進的大師。

大凡假充一樁事物，總有兩個動機。或出於尊敬，例如俗子尊敬藝術，則收集骨董，附庸風雅。或出於利用，例如混蛋有企圖，則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之被假借，不出這兩個緣故。然而假對幽默竟充不得真。西洋人以笑聲清揚者爲「銀笑」（Silver Laughter）假幽默像攪了鉛的得幣，發出重濁呆木的聲音，只能算鉛笑。不過「銀笑」也許是實笑得利，笑中有銀之意，好比書中有黃金屋也；姑備一說，供給辭典學者的參考。

本期撰者

「毅真」是一位地方行政專家的筆名。呂學海先生現在南開經濟研究所擔任行政研究工作。陳建業先生任職於國民經濟研究所。

希聲先生是一位作家，在本刊第三期曾撰「拜訪」一文字。錢鍾書及王頓愚二先生本刊已介紹過幾次了。

時評三則	張佛泉
論政治之制度化	黃正銘
美國新中立法案與中立問題	薩師炯
論政治建設	丁佑
困難累增的敵國經濟	王了一
談用字不當	顧良
梁實秋譯莎翁戲劇印象	

時評四則	劉運誠
德國勢力膨脹後之歐洲局勢	陳碧笙
今日雲南之現金問題	吳醉秋
司法制度與司法人才問題	陳夢家
白話文與新文學	

時評三則	潘光旦
演化論與幾個當代的問題	顧謙吉
戰後復興與生產建設	衍人
發展昆明市的財政基礎	張敬
智識界婦女的自白	方齡貴
荒村	

歡 迎 訂 閱

歡 迎 投 稿

今日評論
 編輯兼發行者
 總經理
 印刷者
 價目

每星期日出版
 今日評論社
 昆明齊雲街一六九號
 正中書局服務部雜誌推廣所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朝報印刷廠
 零售 國幣五分
 半年 國幣二元
 訂閱全 年 國幣一元

中國實業銀行

本銀行成立於民國八年以輔助金融發展實業為宗旨
國內各大商埠及繁盛區域均設有分支行及辦事處資
本總額四百萬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及一切銀行
業務兼營儲蓄及信託會計獨立各種儲蓄及信託存款
訂有詳章手續簡便

中國銀行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本行為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母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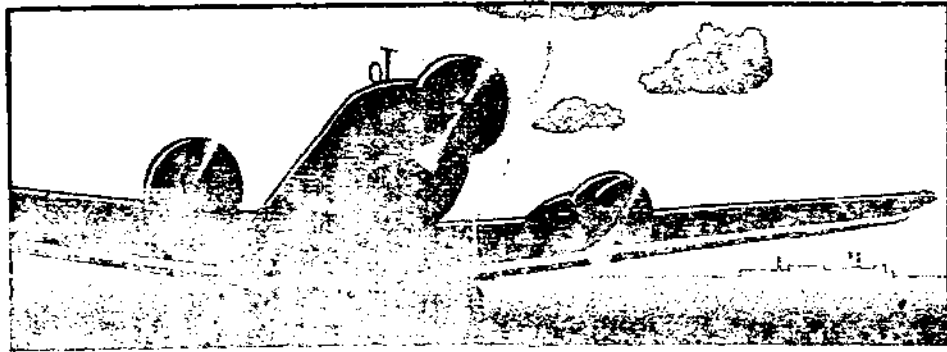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金城銀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利用下列各航線 載客 運郵 輸貨

1 昆明——重慶——西安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2 昆明——成都——漢中——西安轉往——蘭州
寧夏——西寧——涼州
每 星 期 四 由 昆 明 開

3 昆明——河內——轉往——香港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4 昆明——重慶——桂林——轉往——香港
班 期 無 定

歐亞航空公司

昆明 尚義街三號